

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在民族复兴关键当口，确立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关乎旗帜道路方向，关乎党运国脉军魂。因此，必须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融入血脉、植入灵魂，化为坚定的信仰信念和自觉行动。而信仰上的坚定、政治上的坚守、行动上的紧跟，最根本、最深刻的是来自内心的崇敬与爱戴。心灵上的情感认同最深沉最真挚，也最持久最牢靠。

有一种信仰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浓郁革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信仰的力量一往无前、源源不断；信仰的传承筋骨相连、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一生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老革命。父亲习仲勋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3岁参加革命，18岁就组织领导了甘肃境内的“两当起义”，19岁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21岁被推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执行者关押，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得以平反。“文革”后负重受命，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在习仲勋身上，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无论是在老区还是在特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革命风骨初心不变，毛主席曾给他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母亲齐

心也是 13 岁参加革命，17 岁入党，此后几十年转战南北，一心向党、矢志不渝。

父母的奋斗经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影响极其深远。2001 年 10 月，他在给父亲 88 岁生日的拜寿信中写道：“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还经常谈起五六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岳母刺字》等小人书的故事。他说：““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这种浓郁革命氛围的熏陶，使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受到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动摇，先后写了 8 份入团申请书、10 份入党申请书。连很多外国人都都感叹，“习近平先天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

这种“先天基因”和“红色血脉”，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与生俱来的信念本源和信仰根基。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面对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信念动摇等问题，他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把好“总开关”，不能得“软骨病”，要铸就坚守信仰的钢筋铁骨和铜墙铁壁。他在很多重大场合反复告诫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号召全党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既是对 8900 多万党员的时代考问和政治

提醒，也是向国际国内的政治宣告和道路宣示。习近平总书记身上继承和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笃定信仰、远见卓识、历史担当，正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是坚定我们信仰信念的领航灯塔，指引我们永远跟着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有一种磨砺百折不挠——习近平总书记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从1962年受冤屈，被关押审查长达16年之久。这期间，母亲齐心带着尚未成年的小儿子习远平在河南省黄泛区的一个农场劳动，两个姐姐被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习近平总书记也因此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最终到陕北插队当农民。一家人天南地北、骨肉分离。

今年初，《学习时报》先后用26个专版，以采访实录的形式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全国知青中，习近平总书记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他插队去的陕北是全国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也是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知青之一。

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属于老初一学生，只有15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400万“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最小！他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当地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连肚子都填不饱。试想，一个在北京长大的15岁少年，孤身来到穷乡僻壤的黄土高坡，其中有多少困难、多少委屈需要他去面对、需要他去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199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那时候什么活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过。他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是不换肩的。到1975年末，当初来延安的26200名北京知青只剩590人。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梁家河，到1974年10月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知青院子变得冷冷清清，居住的窑洞也变成了冰房冷灶。但他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依然是该干活干活、该吃苦吃苦，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完全是一付“铆足劲扎根干”的心态。这种坚忍不拔，这种志存高远，这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稳健淡定，格局何其大度，胸怀何其宽广！

现在看，这些曲折经历和艰苦磨砺，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15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迷茫、彷徨；22岁离开时，他已经有着坚定的目标、充满自信。有人说，没有梁家河的7年，便没有习近平总书记今天的从容执着和大气磅礴。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正是黄土高原的苍天厚土，孕育了青年习近平宽厚敦实的优良品质和滴水穿石般的至高境界。7年的农村生活、7年的甘苦与共，不仅使他和陕北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从小就对农村、农民和脚下的热土有了更切身的了解和感悟，对改变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增添了毅然决然的抱负和担当。

有一种奋斗脚踏实地——习近平总书记是在长期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巨量、民族多元，决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熟知国情、了解百姓，胸怀全局、把握实际的基本特质，以及顶层设计、系统思考、战略谋划、统筹兼顾的掌控能力，而这种特质和能力形成，必须经过多层次、多系统、多领域的实践历练和长期积淀。在国外选举领导人，只要有雄厚资金支持，加上能言善辩，像特朗普这样的财团老板照样可以胜出，像马克龙这样资浅望轻的年轻人也能一步登天。而我们国家的省长、部长，往往都需要二三十年以上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历练和筛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更是经过了多岗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历练。何况我们国家的很多省份，在幅员、人口上都要超过世界上多数国家，甚至一个县所负责的地域都比有的国家还大。

翻开习近平总书记从1969年下乡当知青，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时的工作履历，可以发现这44年中，他从下乡知青成长为党的领袖，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从政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经几年、都扎扎实实、都政绩卓著，每一岗位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梁家河任大队书记时，他带着乡亲们光脚站在冰水里修淤地坝，搞科学种田，使粮食增产60%；他创办农村铁匠铺子，在简陋的窑洞里打出了小农具；他创建陕西首个沼气池，使梁家河成为全省能自行解决照明供热的第一村。

198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从军委办公厅到河北正定，开始全面执掌一方。可以说，他真正的主政之路始于正定、源于正定。他自己也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在那里，他把念好“人才经”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抓手，亲自向全国发出100多封“求贤信”，亲自邀请包括华罗庚在内的53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经济顾问。

接下来，他离开正定南下福建，一干就是17年多。这17年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现代治理能力得到全面历练、展示和提升。在厦门，他第一次亲历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丰富了改革的实践、开放的实践。在宁德，坚持从严治吏，开启了抓“关键少数”的尝试，严肃处理违规建房，查处400多名干部，展示出铁腕反腐的胆识和魄力。在福州，着力推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曾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个问题。任福建省长，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福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主政浙江，他提出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总结实施著名的“八八战略”，把浙江带上了发展快车道，使其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和排头兵。2007年，他临危受命上海市委书记，虽然只有7个月时间，但马不停蹄考察了全市所有19个区县，力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其殊途同归。

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好多思想与重大战略，早在很多年以前就生根发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正是经过一步步丰富

而长期的实践锻炼，厚植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一经站上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岗位，就立刻展现出非同凡响的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这种气魄和风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可以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在周围的力量，一种能够鼓舞和感召13亿多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戮力奋斗的力量。

有一种梦想强国强军——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我党领袖

伟大梦想要靠伟大斗争去实现，伟大斗争要以伟大梦想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并号召全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十八大以来这5年，我们面临的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前所未有，都难以想象。我们虽然已经坐上了全球治理舞台的“主桌”，但将强未强、树大招风，容易“木秀风摧”；

“东方睡狮”已经醒来，但也面临虎狼围猎的巨大风险，遇到的战略围堵、战略冲撞、战略干扰更加尖锐激烈；重整行装再出发，但新长征路上“雪山”“草地”横亘在前，还有许多“娄山关”

“腊子口”需要征服，需要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深改路上处处是“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事非经过不知难”“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难题、高压、重任面前，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是断难取得成功的，这种气概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就是直面问题与挑战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

着和勇气，挑起了大国领袖的重担，成为领导这场伟大斗争的全党核心和扛鼎巨擘。

请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后，从迅即出台八项规定，到用巡视派驻、机制创新、法规建设步步扎紧制度笼子，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始终以“永远在路上”的鲜明态度正风肃纪；从说出“从来就没有铁帽子王”“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 13 亿人民”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语，到坚决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重大腐败案件，再到“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始终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猛药去疴的决心推进治贪反腐；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始终以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的韧劲，营造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海晏河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反腐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我们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请看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肩重难、直面挑战，对党政军多个领域的改革都亲自挂帅、亲任一把手，每一个领域的重大改革都使命关全局、责任重千钧。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到今年 7 月 19 日已经召开 37 次会议，每次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伟大进程，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越来越实的脚印，进入“施工高峰期”和“收

获期”。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先之劳之、率先垂范，掌舵“中华号”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再请看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这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5年，也是瞄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攻坚克难、开新重塑的5年。这5年，他亲自定夺、亲自组织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军队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上正本清源、找回初心。这5年，他亲自主持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重塑军队组织形态，调整领导指挥体制，优化军事力量体系，使人民军队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被外电称为“破天荒之举”。这5年，他亲自上海岛、踏边关、走戈壁，上战舰、进战车、登战机，入班排、看哨所、去前沿，每到一个地方必视察驻地部队，每年全国“两会”必到解放军代表团共议国是军情。习近平总书记忧军爱军的真挚情怀和强军兴军的殷殷嘱托，是时代的号角和催征的战鼓，汇聚成全军将士备战打仗的磅礴力量。

“新旧相推，日生不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之门已经开启，强国梦、强军梦的步伐越来越激越昂扬。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墨子号”发射升空到“海洋六号”极地科考，从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到国产大型客机C919成功首飞，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国之重器”不断涌现，创新成果惊艳全球，中国人的信心和梦想不断被点燃。这5年，我们一路走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无论治党治国还是治军，我们做了很多过去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许多曾经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世界都在惊呼“风景这边独好”。“中国速度”“中国奇迹”，越来

越响彻云霄、声震全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 87 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来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今天，一个新时代的中国梦、强军梦又一次“光芒四射”、又一次“喷薄欲出”。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深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拥戴的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梦、强军梦一定会善作善成、梦想成真！

有一种责任全球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是在重大国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人类是平等的，世界是多样的，文明是多彩的。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世人眼中，习近平总书记是中国新理念的倡导者、新形象的塑造者、新方案的推行者。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出访 30 余次，每年都有 1 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出访，足迹遍及全球。在国内会晤外国元首、政府首脑 270 多人次，杭州 G20 峰会期间每天要会见 6 位领导人，休息时间仅有 4 小时。今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呼百应，包括 29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约 1500 名代表出席。4 年多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 6 次到访中国，习近平总书记也 6 次访问俄罗斯，两位大国领导人见面 20 多次。

这种亲力亲为，以元首外交引领中国同各方寻求“最大公约数”，打造了不同形式的全球伙伴关系网，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空前高涨，越来越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

这种地位的取得和格局的形成，没有国内的持续发展是不行的，没有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是不行的，没有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斗争精神也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并以政治家、战略家的智慧和魄力妥善处理了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难题，亲自领导指挥了一系列扩大战略优势、维护国家权益的伟大斗争。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实行常态化巡航，一举打破了日本多年来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在南海问题上，亲自决策造岛固礁，设立三沙市，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海方向战略态势，为最终赢得南海维权斗争胜利打造了一个牢靠的战略基地，等于筑起了一座海上长城。针对美菲上演的“南海仲裁”闹剧，立场鲜明，综合施策，斗争有理有据、有利有节，使这个裁决成为废纸一张、“国际笑谈”。这一系列伟大创举和英明决策，展示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凡的战略眼光和伟大的斗争精神。

讲斗争更要讲合作，要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实现共赢。无论走到哪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不忘用最具温度而又充满智慧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每次重要出访，他几乎都要在当地发表一篇文章、接受一次采访、作一场演讲，这在国际政

坛上已经成为重要“品牌”。这一场场思想上的“盛宴”，充分展示出一个大国领袖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思想光芒。

你看，“玛雅人的金字塔”拉近了墨西哥民众的感情，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让美国民众倍感亲切，“三个中哈友谊故事”使哈萨克斯坦人民永远记住了这次演讲。谈发展道路，他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子的人自己才知道”；谈东西方文明，他说“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反驳中国威胁论，他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谈解决全球性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能为这个世界打造一把精巧的瑞士军刀就好了”。访问美国时，他专程到 27 年前结交的美国老朋友家，在炉火旁促膝长谈、茶歇叙旧；访问德国时，他借用“牛顿力学三定律”，向物理学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阐释对发展中德关系的看法；访问爱尔兰时，喜爱足球的他在球场上展示了“令人钦佩”的“一脚远射”，这些都被媒体形容为“极好地传达了亲和的形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今天的中国充满兴趣。他成功展示给世界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风范与气度，更是中国的形象与魅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他为“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人物，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赞誉“习主席提供了榜样的力量”。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说，“看世界领导人，最佩服的就是习近平主席”。

有一种初心人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就有农村情结，他说“我的爷爷也是农民，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我就是从贫困窑子里走出来的。”毛主席在延安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陕北老乡称赞习近平总书记是“贫下中农的好书记”“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习近平总书记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他住的那个院子里，天不亮就站满了前来送行的乡亲们，都是自发来的。当他真要走时，人群中哭声一片，全村老老少少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有13个人步行60多华里一直送到延川县城，并凑钱照了合影。1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青年》杂志记者讲述当时的场景时仍激动不已。他说：“那天，望着送行的乡亲们，我喉头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7年啊，我多少次欲哭无泪，离开时我第一次哭了。陕北的人民养育了我，保护了我。我虽然告别了陕北的父老兄弟，但再也离不开人民。”2015年2月春节前夕，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他首次重回梁家河，见到当年一起生活、战斗过的乡亲们，又一次动情地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最初对“人民”二字的体悟，就来自梁家河，来自那些让他始终魂牵梦萦的陕北乡亲。后来在浙江，他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开辟“之江新语”，撰写了232篇短论，回应的都是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用大白话，谈大事情”，被网友誉为“中国第一博主”。在浙江工作的5年，他“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

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要始终与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

这种朴素的情感穿越了近半个世纪。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庆丰包子铺与市民一起排队就餐，还是雾霾天里在南锣鼓巷与老街坊亲切交谈；无论是在兰州养老餐厅给老人端菜送饭，还是到河北阜平在农民炕上盘腿而坐，那种与民相亲、与民同乐的情感由内而发、纯朴自然。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总书记到家里，就跟亲戚串门、邻居唠嗑一样，没有一点架子，特别亲切。”

2013年11月到湖南调研时，他一下飞机就直奔湘西最贫困的十八洞村，盘山公路走了几个小时，又翻了几座山。村里一个老太太问习近平总书记，“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因为地方偏僻，老太太又不看电视，不认识总书记。后来，全村人都围了上来，一看基本上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怎么扶贫呢？总书记就坐下来和大家拉家常、找办法，最后说：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对对对，就要这个”。今年6月21日，总书记专程前往山西吕梁山区的深度贫困村赵家洼村，他深入田间地头，走村串户，掀锅盖，上井台，坐炕沿，发现这里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是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总书记开出药方：易地搬迁，挪穷窝、拔穷根，彻底解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的扶贫要精、要准，要因地施策、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掉队”。按照这个思路，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从2013年至今，有近6000万人口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到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实现全面小康。这对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目标、一份承诺，更是一片饮水思源的初心、一个矢志不渝的决心、一颗志在必得的雄心。这是最深的牵挂，也是最大的担当。

归结起来说，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红色基因传承中成长起来的，是在艰难曲折困境中磨砺出来的，是在复杂国际斗争中历练起来的，是在极其丰富的革命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这个核心在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中是最“走心”的，真正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袞九章但摯一领。我们一定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学习时报 2017年7月28日）

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党建篇

在这绿树荫浓的日子里，走过96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再过几个月，还将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就在一年前庆祝“七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始终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当3800万八闽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福建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半，在改革、开放、发展、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1988年6月，34岁的习近平赴任宁德地委书记，成为当时宁德地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

上世纪80年代末，宁德基础设施极其薄弱，没电、没路、没钱。到福州开车要8个小时，途经的飞鸾岭有36个弯。外商过来投资，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干部群众思想陈旧，等靠要的多，怨天尤人也不少。“这么年轻的干部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工作，大家普遍热情欢迎，既期盼他能带来新思想、新发展，又担心他太年轻、扛不住。”当时一些宁德干部这样想。

时间很快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后来，我与同志们谈心，形容习书记好比一棵大树，一植根闽东，就成为我们的主心骨，为我们遮风挡雨，还不断输送氧气，让生命增添活力和生机。”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说。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生涯的全面写照。在书中收录的《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习近平以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来比喻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脱贫过程。他在文末写道：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黄褐色封面的《摆脱贫困》显得十分朴实。全书12万字，共收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的29篇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加快发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广泛涉及闽东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内容。

陈增光说，收到福州市委办寄来的2本《摆脱贫困》后，他反复研读：“这本书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翻进去看每一篇都能看到他满满的为民情怀，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一刻忘记人民。”

“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在福建，许多曾经与习近平共事过的干部说起他，都会谈到，“人民”二字是习近平提起次数最多、频率最密、场合最多的词。

习近平曾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都应当同焦裕禄同志作个比较，经常想一想，自己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做到‘完全’‘彻底’了。”

1990年7月15日，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文思萦系，当即填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阕。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焦裕禄的宗旨意识、公仆情怀和奋斗精神，让习近平为之敬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认为，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的为民情怀，让身边的人深有感触。

“我感觉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我从内心敬佩他。我觉得闽东有这样一位好领导，一定有希望。”时任宁德地委常委、统战部长姚智梅在回忆与习近平共事的两年时光时这样说。在她看来，习近平总是想方设法到基层去，了解百姓的所想所盼，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群众在他内心具有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最多的地方。

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习近平就一头扎进了基层。

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三个人下乡调研。第二个月，习近平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走遍闽东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时任宁德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金煊回忆说：“只要不开会，一有点时间，习总书记就要下乡去，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李金煊多次跟随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他说，习近平心里总是记挂着老百姓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每到一村都要走村入户到老百姓家里实地察看。当时有政研室的同志总结习近平到闽东后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

习近平第一次去屏南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蛋招待他——用艾草熬出的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习近平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他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为了让闽东群众尽快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以低调亲民的身影深入群众，开展调研，探索思考，倡导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增光说。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到不通公路的省定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当时办公地点在廊桥边上的土坯房里，午休吃饭就安排在廊桥上。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随后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习书记在下基层的时候，特别注重发现好的典型，希望通过树典型，以典型引路，带动更多地方发展起来。”李金焯说，“习书记常说，地委工作大多数涉及农村，没有典型的东西，说服不了基层。”

1990年1月，来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的同志，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叫《滴水集》的册子。这本近400页的册子里，一共有72篇文章，收集整理了当时宁德地区的各领域典型经验例子。

李金煊是当年《滴水集》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回忆说，1989年底，习近平请他牵头准备这次会议典型材料汇编，并交代他：

“要把这两三年工作中典型的、有进步的、有发展的都收集起来。”

筹备小组经过43天的调研，走遍闽东各县，最终整理出一本材料。册子编好了，习近平看过之后，建议取“滴水穿石”之意，把这本册子的名字定为《滴水集》，还亲自做了序。

后来，这本《滴水集》中具体详实的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1989年2月25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山鸡飞上凤凰台》的报道，说的是宁德农民给地委干部作报告的新鲜事。

福安市坦洋村老大队长刘少如带头办起福安市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带领全村种茶致富。习近平到坦洋村调研时评价刘少如：官不大，但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习近平亲自邀请包括刘少如在内的八位基层农民代表到行署会议厅向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用一村、一户、一人的变化，讲述了十年来改革政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

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让百姓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重心。”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说，“习近平同志把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事，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困难。”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钟雷兴说，“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1989年3月3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雨水给早春的霞浦增添了几分凉意。这一天，是霞浦县的接访日。

一大早，霞浦县委党校的门口就聚集不少上访群众。得知地委的领导要来接访，很多人早早就赶到了这里。

“我要找地委习书记。”人群中，一位上访者高声说。

接访一开始，这位上访者就奔着习近平去了。习近平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询问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原来习书记这么亲和。”一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的群众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困难一五一十和习书记说了。原来，他是霞浦乡下某学区的一名教员，因家中情况特殊，老母亲孤身一人留在城里，体弱多病，年事已高。

“我放心不下老母亲，想调回城里照顾她，以尽孝道。”他说。

习近平认真听完他的叙述，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对照有关政策，明确表态：可以回城，考虑今年暑假给予解决。

这件事习近平一直挂在心上。没过多久，他向相关部门跟踪了解这件事情的进展，当得知事情并没有抓好落实时，一向态度温和的习近平却显得特别严肃起来。

习近平批评相关办事人员说：“这个问题符合相关政策，没有违反原则。你们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想，遇到这样的情况，让孩子回到城里照顾他老母亲有什么为过呢？”并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给我答复”。

“习书记心里有群众，从来不是光喊口号。”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回忆说，习书记关爱民生，总是把群众的苦，群众的难放在心里，常常带着四套班子的干部到基层接访群众，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对此，时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文贵深有感触。“习总书记赴任福州的第二天，就下基层调研，了解群众想什么、有什么困难，这让我们印象深刻。当时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变化了。”

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1991年3月，习近平登上低矮逼仄的连家船，实地察看船民的生活，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船民搬迁上岸问题。十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搬进了台江区红星新村的新居。

自1990年起，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办实项目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项目的最终确定采用人民群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年终公布项目完成情况，并让群众投票评选完成最满意的项目。

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改善百姓居住条件。2000年7月，已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正午，走进拥挤闷热的福州苍霞社区棚屋区，与各级干部一起亲身体会群众疾苦。在他的推动下，2001年5月1日，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就全部竣工。

“习总书记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首位。”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说。

赵汝棋当年曾在市委政研室工作过，政研室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讲话、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长时间都俯

首案前。有一次，习近平对赵汝棋说：“你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政策研究上，要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去。”

赵汝棋说，后来政研室根据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将2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下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梳理后形成短平快的“一事一报”刊发在《福州调研》上。

习近平对“一事一报”非常重视。赵汝棋说，习总书记基本上对所有的“一事一报”都要看，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批示，比较详细的批示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有的他认为还不够深入的，会批示再深入调研。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二、“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

共产党人要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自身不正，何以正人？“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第二关是“人情关”。是刚正不阿、铁

面无私，还是手下留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千百万人心中失去信任！

——习近平《摆脱贫困·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闽东夏日，万木葱茏，坐落在半山腰的宁德老地委办公楼静谧庄严，院子里七棵绿树随风轻摆，树叶的沙沙作响陪伴着石砌三层办公楼。

“沙，沙，沙，沙……”这是1988年的一个清晨，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院子里清扫落叶和垃圾。在没下乡的日子里，这是他上班前常常做的事。办公楼的卫生原来由年轻人做，习近平来了后，很自然地参与进来。在他带动下，地委的干部们也都渐渐早来上班，一块打扫卫生。习近平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有说有笑地与大伙聊工作聊生活。扫院子成为他与干部们沟通的一个好方式。

李金焯回忆说，习近平特别认真，不仅扫院子，还一级级清扫通往后山的石阶，即便秋天黄叶满地也是如此。打扫完卫生，他就去一楼走廊尽头打开水，拎上自己在三楼楼梯左转第一间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当年习近平的办公室加上会客室一共22平方米。一进门是会客室，墙角简易的木架上放着淡黄色搪瓷脸盆，一圈小沙发，一副简单的茶盘，一个热水瓶和两个写着“宁德地委”的白瓷杯，这就是当年习近平接待客人的全部家当。

“习近平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简朴得出乎我们意料！”回忆往事，姚智梅说道。到任那一天，习近平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坐一辆车下来，没有搞欢迎仪式，更没有搞任何排场。地委办的同

志通知地委干部说：“新书记来了，请大家到会议室开个会，见个面。”大家才知道习总书记已经到了。

第一次打交道，宁德地委领导班子就对习近平的艰苦朴素作风有了深刻的印象。

到任后，习近平要求办公条件都不能变。办公室、宿舍不做一点翻新装修，宿舍里简简单单只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他的用车和驾驶员，也是从前任手中接下的。那辆已经有十多万公里里程的上海牌老轿车，后来陪着他跑遍了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

平时，他就在地委食堂里排队凭饭票打饭吃，理发也就在行署边上的一间小店理。这期间，后勤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习近平开小灶，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样吃饭很好，和大家一起，可以了解情况。”习近平喜欢和大家交流，打成一片。他和干部们坐在一起，聊聊天，顺便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工作上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下乡去了哪里？家里有没有困难？

后来，地委办的一位同志跟习近平说，书记您别去排队了，我们给您买了端过来。他却回答说：“不用麻烦，我又不是不能做。”习近平和普通干部打的菜也差不多，一份饭菜大概一角多，一个月不到十元。很快，地委的同志们都和习近平熟络起来，也打心眼里对他又敬又爱。

不仅严于律己，习近平对自己的家属同样从严要求。姚智梅回忆，习近平母亲齐心和妻子彭丽媛来宁德看他时，他不要公家接待，就在宿舍简单搭个炉灶，一家人自己做饭吃。大家还看到彭丽媛挎着菜篮子去行署前面的菜市场买菜，生活跟普通干部家庭一模一样。

“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三十多岁的年纪，还是地区一把手，却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正人先正己，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姚智梅回忆的话语中满是崇敬之情。

打铁还需自身硬。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说：“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洁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

1988年底，习近平采用“拉练”的方式，到宁德的九个县开现场会。一天中午，工作队伍来到霞浦县溪南镇。午餐时，当地干部拿出了水果和高档烟酒招待客人。一看到那大约价值十元的高档烟，一向亲切待人的习近平沉下了脸。他拿起烟，跟在场的干部严肃地说：“这包烟，值老百姓多少个工分！”从溪南镇开始，后面一路上各地都不再准备烟酒。

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经喜回忆，在习近平的严格要求下，宁德地委风气一新。1989年工作总结报告这样提到：“目前地区几套班子成员中没有一人建私房和经商办企业，在工作中也没有乱批条子和为私人介绍承包工程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领导成员不配专车，实行私人用车收费制度，禁绝大吃大喝，下基层一律用工作餐。大家都做到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防微杜渐。”

“一身正气敢碰硬，两袖清风不染尘。”1990年6月，习近平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时说道，“不贪，这是

对干部起码的要求，也是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做得到的，但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而言，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敢于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

2013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和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1988年的冬天，对于宁德的不少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冬天。

“人生三大事——盖房、修墓、娶媳妇。”当时宁德地区的干部队伍受陈旧观念的影响，纷纷占地建房。根据一份当年宁德地委清房办的材料记载：至1988年底，干部建私房人数之多，占地面积之大，建房标准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与闽东经济贫困很不相称；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成为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成为削弱干部队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到任宁德的第一轮调研中，习近平就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决心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一次会议上，针对有干部提出清房问题牵涉面太大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就是“要紧紧盯住四百多名处级干部”。他对张经喜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的人民？”从他的这一提问中，张经喜刹那间领悟到这位年轻书记惩治腐败的锐气和决心，心中原有的些许犹豫顿时一扫而空。

1988年12月30日，离新的一年到来还有两天。习近平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然后全面清查，再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停”即在1989年春节前全面冻结。

“清”就是摸清底子。

“理”就是在停、清基础上，转入查实况的攻坚阶段，不纠缠枝节。

一声令下，建私房行为全面冻结。当天的会议之后，宁德地委雷厉风行，紧紧抓住春节前夕这个私人建房高峰期的关键节点，在全区开始清房。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干部有私房占公房问题也被纳入彻查范围。

回忆起那段清房工作的经历，时任福鼎县纪委副书记、福鼎清房办主任的洪恒针仍激情澎湃。

福鼎当时刚刚规划出了龙山开发区，其中的上龙山一带由于离县政府近、地盘又小，成了干部争相占地建房的“香饽饽”。洪恒针一从纪委抽调到清房办工作，接到的任务就是去拆上龙山六户人家的“门头”！所谓“门头”，其实就是房子外的院门。这六户人家，四户是处级干部，都占道几十厘米修建自己的院子。在福鼎人的习俗里，拆“门头”是要触大霉头的，谁敢拆，那就把主人得罪大了。

敢不敢拆？当时福鼎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歌谣：“党风正不正，关键看龙山。”

习近平对于全区清房工作的每一阶段进展，每一次会议，每一个事项，都时时过问，一抓到底。他获知福鼎的情况后，说道：“问问这些干部，是想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还是国家法律的处理？”

拆！洪恒针在丈量清楚占地多少后，坚决地拆去了六户人家的“门头”。福鼎县同时还严肃处理了2名正处级干部和13名副处级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问题。

清房工作迅速在全区从严公正推开，赢得百姓一片拍手叫好声，大快人心。

当回想起习近平的这次清房工作，张经喜一口气说了五个“非常”：“态度非常坚决，决心非常坚定，力度非常大，实效非常好，群众非常拥护！”

不仅是清房，习近平在宁德和福州都注重查处一批腐败的大案要案，特别对于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纪的，他强调要“敢碰硬，严肃查处，不能姑息”。张经喜说：“那段在习总书记领导下开展纪委工作的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习总书记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炒股热”，福州的不少机关干部也心痒痒。对此，习近平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福州的干部都不准炒股。“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时候很多干部所谓的买股票，其实是占着职权之便去买企业的原始股，这是干部占企业便宜！是不正之风！”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说，这一决定得到了福州干部群众们的坚决拥护。

“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这样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要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

一、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

二、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

三、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

四、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五、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

六、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

七、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

八、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

九、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

十、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

十一、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

十二、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共5条：

一、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

二、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

三、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

四、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

五、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1993年6月，习近平在福州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上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专门强调了五条廉政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不得收受以各种名义赠送的礼金、有价礼券和贵重礼品；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参与炒买炒卖股票；不能利用党政机关的职能去经商办企业；党政领导和执法执纪等监督部门不能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能收取回扣。

担任省长后，习近平在一次全省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要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的现象发生，对搞好重点建设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对清廉党风政风的形成起到长效约束作用。

1989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四句话：第一句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作为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第二句话，“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第三句话，“寸心不昧，万法皆明”，贪污受贿，鱼肉乡民，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第四句话，“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利益问题上，“拿来主义”要不得，不能图实惠，谋私利。

“与习总书记共事的几年是我深受教育的一段经历。”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深有感触。他说，从反腐倡廉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都强调要从严要求。

时至今日，赵守箴仍然对自己到福州工作参加的第一次常委会记忆犹新。“习总书记在会上说，我们一起工作要互相帮助，更要互相监督。每个人都要诚恳虚心地接受监督，形成风气。”赵守箴一字一句地回忆当时习近平说的话，“这两句话令我深受教育，到今天还觉得受益匪浅。”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里这么写道。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

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党带领闽东人民取得了翻身解放，也只有党才能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地抓好思想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习近平《摆脱贫困·同心同德 兴民兴邦》

在福建，习近平先后在宁德、福州担任党委一把手多年，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着力探索的问题。其中，思想建设、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是他重要的抓手。

习近平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

到任见面会上，习近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姚智梅说，当年谦虚好学的习近平给班子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增光回忆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读书学习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特别喜欢看马克思主义原著，看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当年工作时，我经常到习近平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在一堆文件材料中经常能看到翻开的《邓小平文选》”。

抓思想建设，习近平着重抓学习，高度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显著特点。

1990年5月，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

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1997年和2001年习近平分别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两篇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

“习近平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陈增光向记者回忆道。

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习近平“夜找书店”的故事。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下党是寿宁最边远的山乡。习近平一行从县城出发，沿崎岖山路步行2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晚饭后，他们又步行回来，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多。大家不仅疲惫不堪，而且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匆匆处理一下，都赶紧回房休息了。处理完脚上的血泡后，习近平思考着白天调研的收获，竟然毫无睡意。他问地委随行人员：“知不知道哪里有书店？”大家都回答不清楚。于是，他决定自己到街上找找。

深夜的寿宁街头，一片寂静，空空荡荡，偶有行人经过。习近平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一家书店。他很高兴，走进书店，看了又看，找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赶紧买下来，回到宾馆细细品读。

多次陪同习近平调研的连德仁在日记中记载：每次习书记来寿宁，晚饭后必到街上逛书店，而且是认认真真看，不是简单地逛一逛就走了。

让连德仁印象更深的是，习近平第一次到寿宁调研，就要求县里把《寿宁县志》找出来认真阅读。这还不够，他又请人找来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期间写的《寿宁待志》。采用第一人称写就的《寿宁待志》，既是有地方色彩的志书，又是冯梦龙在任四年的总结。习近平边看边点头，对提倡男女平等和“无讼”理念的冯梦龙倍加赞赏。

1988年8月10日，习近平到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他看完《霞浦县志》，又点名要看清代李拔编撰的《福宁府志》。工作人员找到后，他高兴地说：“今晚可以轻松地过了。”

有一次，与习近平一同调研的陈增光忍不住问道：“习书记，这么辛苦跑了一天，为什么还要加班看县志？”习近平对陈增光说：“一县之志，就是一县之史。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学县志，就是学当地的人文历史；尊重县志，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记载，有正面，也有反面，可以供后人借鉴。”

当时地委班子的成员们都被习近平这种刻苦读书的劲头所感染。“习书记爱读书、好读书，而且能从书中汲取智慧，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把握未来。”如今大家聊起时，都说习近平总书记有如此宽广的世界眼光，洞悉世界发展大势，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这与他长期坚持读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仅带头读书学习，还在多个场合语重心长地叮嘱领导干部要好学乐学，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经常给自己“加油”，不断给自己“充电”。

海拔800多米的屏南仙山草场，地远山高，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间小道通往外面，很少有领导干部去过。

1989年8月底，主政宁德还不到一年的习近平打破常规，率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各县（市）委书记及地直机关部门负责人，专门来到这里，举办一期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

盛夏的仙山草场酷暑难耐，大家走得大汗淋漓。实地看到百姓肩挑手提运送农产品，亲身感受大山深处百姓的艰苦生活，干部们顿时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沉重，上了一堂加快发展的“现场课”。

就在这偏远的大山里，干部们平心静气、认真学习。围绕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如何增强党的领导、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大家通过互相交流、碰撞思想，有了很大启发。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读书班小结时，习近平提醒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应当有一种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要虚心向书本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

“在仙山草场，大家边学边思边议，对学习这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区领导干部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领导班子学习中

心组的理论学习自此开创了一种新形式。”回想起这段往事，李金焯不无感叹地说，习近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习近平这样忠告地委的同事们。在大家看来，习近平要求干部注重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素质，从而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1988年9月，宁德地委部署在全区开展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再学习再讨论。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不少地方的干部，提高了认识，开拓了视野，重新分析了本地的优势和劣势，寻找落后的主要根源，调整修正了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促进了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组织建党，重在队伍建设。

“习总书记关心大家学习工作，也关心大家的成长。”陈增光说，宁德是艰苦地区，优秀人才少，优秀青年干部更少。习近平主政宁德时，积极探索青年干部宏观管理办法，并大胆试验。

1989年3月，宁德地委决定对地直机关新任领导实行试用制。从当年起，凡新提任的地直党、政、群机关副处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一律实行试用制，试用期为一年，期满考核依成绩决定去留。

“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的这一用人制度改革，在全国属于首创，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张经喜回忆道。

张经喜说，当时闽东落后，干部思想状况不一，有的急躁冒进，有的思想贫困，这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从

政杂谈》中说，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希望，他们热情高、有闯劲，但也有许多短处。在成长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

他提出注意四忌：一忌急于求成。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二忌自以为是。任何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都会对真理产生排斥心理，使我们与真知灼见隔离，与成功无缘。三忌朝令夕改。“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青年干部要不为一时议论所动，不为一时扬抑所惑，不追赶时尚，不迎合潮流。四忌眼高手低。在“做大事”上，青年干部都要有一种老实的态度，甘做最普通的事，乐于扮演拾遗补缺、跑龙套的角色。

“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是造就和选用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用人理念一以贯之。”赵守箴说。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对青年干部的一番话让大家感到十分温暖：对青年干部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又要热忱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从1991年开始，本着“全面锻炼提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福州在年轻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岗位轮换、纵横交流、外派挂职、担任助理、压担子锻炼。

广为闽东干部熟知的是，习近平提倡念好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他说：“干部问题就跟摆棋子一样，要摆得恰当，发挥最佳效果，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他强调，闽东是一个穷地方，需要一批能吃苦、讲奉献的人去工作。对闽东干部的评估不能注重于他近期内做出多少醒目的成绩，而要注重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去做长期性、铺垫性的工作。

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为官四要”，即“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

1990年7月25日，在福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时说，有“四种人”不能用——

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做官要求一直得到满足，唯独一次得不到满足，于是就躺倒不干。

二是善于钻营的人，专门去揣摩领导意图，精力不在工作上。

三是“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做，专摆花架子，不肯办实事，也叫作“空里客”。

四是欺上瞒下的人。

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要你当官，不是叫你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搞自己的‘根据地’，来当‘山大王’。在其位谋其事，谋共产党的事，谋社会主义的事，不是谋你自己一家一户的事，不是谋你小集团的利益。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首先在于领导班子一班人，能不能形成一股正气，为人民谋利益。”

“习总书记对当官为什么、怎样当好官、选什么人当官都有自己的思考。”陈增光说，一个地方风气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人用人的导向。习近平襟怀开阔、识人善任，对干部既真诚又严格。在宁德的两年，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合适的岗位。

干部要严管，也要保护。

时任平潭县委书记刘嘉静在开展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难题。对此，习近平还专门作了批示，鼓励刘嘉静克服困难，大胆地做好工作。过了20多年，刘嘉静回忆起总书记关爱干部的情境，仍然很激动。

不仅重视选人用人，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打牢基础，把堡垒建在基层。针对农村中存在“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的现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说话没有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

1989年1月7日，习近平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批示，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调整不适应、不协调、不健全的“三不”班子。

为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1989年，根据宁德地委的部署，全区整顿、调整了429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评出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3650名，占党员总数4.4%，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群众反映这次评议是‘雷声不大雨点大’。”说起这件事，张经喜历历在目。

1991年起，福州市委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纲要。两年后，一类支部从52.8%上升到86.4%，三类支部从8.37%下降到2.4%。全市162家具有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还出现了外商主动向市委“讨”书记的新气象。

“‘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上级机关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忙来忙去只是瞎忙。”这是习近平1990年6月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这是1995年4月习近平送给福州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的一副对联，借此褒扬军门社区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管理的好做法。

习近平前后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2014年11月，已经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他特意走到“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的对联前，给大家介绍当初为什么要用“褙”这个字，重温了他初来军门社区时看到的情景。

那是1991年初，习近平第一次到军门社区调研，军门居委会党支部刚刚成立，办公条件很简陋，还是低矮的平房，与社区民房一样，墙壁上都褙着报纸。

“当时，我们社区党支部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习总书记触动很大。他给大家加油鼓劲，每个人都备受鼓舞。”从1972年起，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就在这里工作。林丹说，后来，在社区党支部带领下，社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习近平第二次来调研时，看到这一情况很高兴，这副对联脱口而出。

“20多年来，这副对联一直贴在我们军门社区展厅门前，这14个字激励着社区每一位工作者。”林丹说。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党员、社区管理者、志愿者拧成一股绳，为社区管理和服 务献策出力。军门社区探索出的“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已在福州全市所有社区推广。

“大伙儿就是记住了对联上的一句话，齐心协力，创建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还获得100多项荣誉。”林丹这样向习近平汇报。习近平叮嘱她说，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

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这是2016年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成为福建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力投身新福建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福建日报 2017年7月13日）

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篇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从来不甘人后，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当中，“机制活”可谓根本保障。机制一活，发展大势气象万千，发展大潮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总书记对福建改革发展寄望甚殷，关怀备至。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其探索与实践，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推动福州国有企业改革；他六年七下晋江，在多次调研后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他倡导建立外经“一栋楼”，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家回信，呼吁理解、尊重、爱护、支持企业家；他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当年的探索历程，我们仍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经济体制改革

迎难而上，敢为天下先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

——2002年，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背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则存在姓“社”或姓“资”的不少争议。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卡”住了。

“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省政府顾问团成员、时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明森回忆，“压力来自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

陈明森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十来年，即便是决策层，也有不少人对企业搞股份制改革一时不能理解，也无从下手。

1991年，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酝酿上市，找陈明森帮忙制订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听说福耀谋划上市，习总书记想了解情况，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聊。”陈明森说。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陈明森回忆道，同他一起受邀的还有当时的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习总书记开门见山，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显然，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习近平的一席话，让他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实感受。

这次聊天后，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很快决定，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股份制改革。这是一家从事马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前体量偏小、经营面偏窄。

1992年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经济研究中心递交的《关于加快开发区建总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建议》上作出批示，“抓紧落实，尽快促成”。

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其间虽亦经历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业顺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挂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后，习近平持续推动福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几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当年，福州就选择了近10家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有明确投资项目的大中型国企作为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陈明森记得很清楚。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说过，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当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福州市的几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跳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资，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文中说，福州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拳头产品”“全国单打冠军”和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据初步统计，1994年福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48.6亿元，增长45.1%。

“推动国企改革，习近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调研国有企业时多次说过，摆脱企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改革。”在时任福州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庆云看来，当年国有企业能否实

行股份制的争论与探索，带来了新旧观念的激烈撞击，而改革攻坚，无疑成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兼任福建省国资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国企改革。

六年七下晋江

【背景】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长的6年里，7次来晋江调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浅。”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说。

陈章进今年76岁，已退休在家。老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4次陪同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刊发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老陈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对晋江发展如此关注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晋江穷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饭填肚子。”陈章进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记得当年的苦日子。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奋起突破“左”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特点，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陈埭成为我省的第一个亿元镇，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到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个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一个亿。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继续。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1994年，这个县级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老陈记得，在1999年的那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

以乡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晋江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多则多矣，然而“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富则富矣，却是“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究竟要走怎样的路子？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近平除了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重点走访了恒安、浔兴、亲亲、优兰发、环球等十几家企业，与企业家交流谈心。他问得很细，经常一个厂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老陈回忆起调研时的点点滴滴，“每一回进企业，他都仔细询问有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要怎样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难。”

“晋江市委市政府按习近平在调研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积极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举办各类博览会，开通晋江企业网等，还致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创新创业创新园、高校科教园等5大创新载体。有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原先小个子的民营企业，就能长得更高，长得更快。”谈起晋江经济的发展变化，老陈深有感触。

安踏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缩影。

“习近平平易近人，我们办企业的，喜欢跟他说心里话。”回忆起16年前的场景，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他便径直来到安踏展馆。在这里，他与丁世忠有了约20分钟交流。

当时安踏成立9年，只生产运动鞋。习近平听完介绍，对企业发展提了三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

而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在晋江企业家中亦相当欠缺，为“大牌”代工是晋江鞋服企业赖以生存的生存模式，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会后，安踏决策层开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响，要与匡威、双星、李宁等当时国内一线体育品牌一决高低。

安踏决定，力邀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企业代言。很快，央视播出了安踏广告。

习近平对于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晋江企业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紧跟安踏之后，晋江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的体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弹力胶、能量环、远红外保暖科技、防泼水科技、智能跑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新已成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为国内体育品牌龙头的关键。2016年，安踏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成本达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营销收入达133.5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0%。在体育用品行业排名中，安踏市值紧追耐克、阿迪等业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身着一件深色运动羽绒服，上面红色“安踏”商标分外醒目。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晋江的企业家们倍感振奋：“这是总书记对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相继落户晋江。很多晋江干部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一脸骄傲。现在，晋江已建成纺织服装、制

鞋 2 个千亿和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等 5 个百亿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过 700 家；拥有驰名商标 42 个、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 46 家。

总结“晋江经验”15 年来，晋江人民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至 2016 年，晋江连续 23 年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第 16 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行列。

政府职能转变

放胆、放权、放手、放活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不转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从谈起。”

——2001 年 3 月 24 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外经“一栋楼办公”

【背景】上世纪 90 年代初，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慢、审批难，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各部门办事窗口集中于一栋楼，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投资项目审批做到“马上就办”。从“一栋楼办公”推开，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还形成了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机制。

“就是这位韩国客商。”福州马尾区环保局局长许开东指着桌上的一张合影对记者讲述 26 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这位韩国外商来到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说要来马尾办金刚石加工厂。接待他的正是许开东。那年，许开东毕业后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在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代办”各项审批业务。

许开东说，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是当年马尾区为落实习近平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而推出的创新举措，而“代办制”，亦为全省首创。“仅仅两天，所有的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海关登记……我们全部代理搞定。当时，外商感到很意外，这和他们来中国前听说的不太一样。这位韩国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这张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当时刚设立的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栋楼”。

设立“一栋楼”的倡导者，便是习近平。

那时候，福州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由于“软环境”不配套，“硬件”的效益发挥不出来。

“审批外资的环节多、手续繁、效率低是突出问题，帮外商跑审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门盖一堆印，一套审批手续办下来，至少要一两周。”许开东说，外经“一栋楼”设立后，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可以一口气办完外经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

“‘马上就办’的提出，以及‘一栋楼’这项工作，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前者，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

执政理念，后者就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外经“一栋楼”工作的龚雄介绍说，当时在福州，政府职能未能转变，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有一个项目审批竟然要盖130多个公章。

“习近平还倡导将外经‘一栋楼’的工作机制从‘楼内’延伸到‘楼外’。针对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合各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龚雄说。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龚雄依旧对当时的一件事印象颇深。“1993年，一个重大台资项目落地福清市，建筑队正在施工，有栋楼施工完发现楼板有些开裂。当时台商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认为有安全隐患要求重建。”

那时候，各部门对此有分歧，有的部门认为“裂了无非就是做个修补，不碍事”。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听了各方意见后，当场拍板：“重建！”“习总书记认为，百年大计，不能疏忽，这又是重大项目，处理不好会影响外商在福建的投资信心。”龚雄说。

会议结束，形成纪要，迅速落实，台商的问题得以解决。如今，这家企业已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提高办事效率，还需要简政放权。

在时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金梯眼中，习近平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审批制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那几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办事效率的十五条意见。

“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审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限给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市投资区、郊区福兴投资区、马尾快安投资区；凡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可实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一次性报批等。”

吴金佛说，当时习近平多次在会议上谈及简政放权。“他反复强调，要把能放的、该放的权都坚决果断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胆、放权、放手、放活；一时无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续简化，服务优质。”

真抓实干，雷厉风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时福州的政府机关作风焕然一新。20多年过去了，“一栋楼”早已转化为如今的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当时“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的故事仍在流传。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时至今日，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福建仍在先行先试，持续提速。

给企业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全国引

起巨大反响。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急企业家之所急、忧企业家之所忧，关心企业家成长，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没想到”“太欣喜”，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麟回想起3年前总书记的回信，仍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还专门给企业家们写了363个字的回信，大家特别振奋！”

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30年后，福建的企业家们找到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黄文麟，写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一封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从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业家依次传阅，字斟句酌。”

很快，总书记满怀关切的回信从北京飞到福建。“我认真阅读了信件，注意到开头处写着‘企业家同志们’，可见这封信不仅是习总书记对福建30名企业家，更是对全国企业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与诚挚要求。”作为前后“两封信”的主笔起草人，黄文麟认为，“习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我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是全国企业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至高无上的光荣。”

黄文麟回忆道：“1984年松绑放权的呼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逼出来的，当时企业连修个厕所都要盖20几个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习近平到中央任职后，仍多次提起松绑放权这一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会见老同志时赞扬松绑放权在全国的影响。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

2001年3月24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他说：“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在会上说的那句‘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深受感动，还被作为大标题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报》上。”当年的报纸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黄文麟心里还是暖暖的。

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习近平一直是这么做的。

“各种检查、考试太滥了，从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厂长了。”1991年年底，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和厂长们座谈时，几个厂长说起不久前福州市机械系统有7个厂长罢考的事。当时很多部门都可以出题考厂长，比如普法知识、经济合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保密制度、设备管理等，如不及格，还要重考、补考。习近平当即表态，不再考厂长了。同时他强调，这样说不是厂长

不要再学习了，而是说最好的学习应放在岗位上。对厂长素质有关部门也还是要考核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同样还要。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泉州，企业家们谈起习近平的关心，满怀深情。

1998年8月26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晋江西滨镇调研。

在民营企业优兰发集团的生产车间，习近平边走边听边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满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国内不少行业受到冲击，并不景气。而优兰发由于引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产品供不应求，基本没受影响。

“闽南企业家敢拼会赢，你们也不能满足，要不断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来。”习近平说。

之后的问题则大大出乎优兰发集团董事长柯文托的预料，习近平问道：“公司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企业可以建支部嘛，不然党员平时怎么过组织生活。”

习近平对企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记住了。1998年底，优兰发集团就成立党支部。此后的发展，老柯也逐渐明白“党建强、发展强”的道理。自公司成立党组织以来，90%以上的创新成果都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党员创新平台完成。

从优兰发开始，晋江也成为探索非公企业党建的热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1306个、党员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业，成为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单位。

“企业家的事情，习近平特别上心。”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回忆道，比如说，民营企业一开始靠自家闲房生产，企业发展了，要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用地问题比较突出；各项手续的办理太繁琐，时间长，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还有很多村向企业收管理费，增加企业负担。习近平在调研中了解这些问题后，督促政府为企业解决。晋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所有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时间办结。随后，针对“村里乱收管理费”，晋江发文禁止向企业收管理费，同时对村集体收入不到20万元的村，由市财政补到20万元。

习近平与企业家的互动，让4次陪同调研的陈章进很有感触，也让他对习近平在泉州与民营企业企业家座谈时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提倡党政干部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搞权钱交易。”

改革惠及民生

增进福祉，让百姓真正受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最根本出发点。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习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时任福建

省长习近平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历经15年的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和持续改革，这场由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间，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谋划改革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个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森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当时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上。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同志当年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亲自抓起和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黄建兴刚担任省林业厅厅长，时任省长习近平就专门找他谈话。

“当时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业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话，黄建兴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干林业，很多人只见林，不见人。但林是人种出来的，人对林的关注、感受、利益关联却往往被忽略。你们要抓紧做好调研，尽快开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户，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习省长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他说，‘为官一任，我们必须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险，但要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选择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县。

据黄建兴回忆，当时武平在进行更换旧林权证时，由于“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的历史问题，导致换证工作进行不下去，纠纷不断。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

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各选一两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虽然没人反对，但结果如何，时任武平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没把握。武平县 37 万人，改革涉及的林农就有 35 万人。“改革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 30 多个村到 200 多个村，随着改革推开，问题也在增多，比如这个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的所有权难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到位，这让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

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习近平到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2002 年 6 月 20 日晚，在下榻的宾馆，严金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武平县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事项，林改只是其中一点。听完汇报，习近平特别把林改“拎”出来，语重心长地说：“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习近平亲自到点上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严金静回忆说。

通过调研，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调研结束后，7 月初，武平县便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全力推进林改。

“虽说有了一颗‘定心丸’，但我还想多听听省长的意见。”7 月 27 日，严金静专程到福州，习近平也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会面。在这次一对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旧

认为林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再次强调，要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

回来后，严金静专门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阶段性工作报告。8月29日，他把报告送到习近平办公室。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就在报告上批示。

这之后，在省林业部门指导推动下，武平县的林改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总结武平等地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6月9日，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经过深入调查，以《林权分到户，小康上了路》为题，报道福建林改激发林农活力，带来勃勃生机。

林改如何持续推进？黄建兴回忆说，习近平当时向全省林业部门提出，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这些话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进。”黄建兴说，根据这三个问题，福建省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实效。“针对钱从哪里来，永安首创了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实现了‘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针对树要怎么砍，当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到‘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规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针对一家一户经营，我省探索以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组建林业新型合作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

确保收益权”作为文件的核心内容，林改上升为国家决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势。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实现了生态美和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武平变化，让严金静颇感欣慰。从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盖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亿元提高到104.67亿元，财政收入从1.12亿元提高到8.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残留物超标严重；畜禽养殖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企业使用过多抗生素或违禁使用添加剂、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残留物增加；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设备落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食品后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亲力亲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监管体系，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 13 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 2017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时间回到 16 年前，习近平正是在福建打响全国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战。“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 2001 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谈及这项工作时的一席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现在再来回想十多年前习近平倡导并推动的这场‘民生战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创精神和为民情怀。” 钟安平说。

钟安平，2013 年退休的原省经贸委副主任、省食安办主任，这场战役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瘦肉精是当时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敌’。2000 年 5 月，福州组织了一次抽检，结果令人咋舌——定点屠宰场的瘦肉精检出率高达 76%。” 钟安平说。显然，这就是习近平口中人民群众“不放心、不满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 习近平说。

2001 年 2 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阅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此前不久，省政协委员金铁平在省两会期间提交的“加强食品卫

生的管理、检查和监督”的提案，已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

“当时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协提案的建议落到实处。”

省长的接连两次批示，在全省吹响了治理餐桌污染这场战役的号角。

“为何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习近平曾在会上这样问大家。他认为，问题就出在体制机制上。”钟安平回忆说。

在批示中，习近平着力于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他强调：“农业生产要推广绿色食品标准，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远离各种饲料药物添加剂，努力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无公害、无污染的产品；环保部门要强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工业‘三废’对农产品生产造成污染；卫生监督和工商管理部门要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加强对进入市场农产品的检验，坚决防止被污染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对已进入市场的被污染农产品，要依法对销售者进行惩处；环保和卫生检验部门尽快建立科学的检验标准，完善检验技术。”

“在当时，对餐桌污染明确提出综合治理的路径和机制，非常不容易。”据钟安平回忆，当年，在各有关部门上报的治理方案中，习近平最终肯定并拍板了原省经贸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于，我们所报的治理举措更全面周详，更系统有力。”

根据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个部门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联席会议，自2005年起又改设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这场“舌尖上的安全”守卫战中，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

进，逐步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各部门开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头猪从“八个部门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显综合协调机制作用的最好例证。

2001年8月，习近平曾在福建电视台演播中心接受央视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采访中，他介绍说，我省已经率先建立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信息网络平台。这样，每天定点杀了多少猪，市场上又在卖多少猪，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出结果。”钟安平回忆道，在那次采访中，面对记者各类提问，习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坚定。

“记者问省长，民间有一种让猪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没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猪，45度的坡准过不了，这种方法可不可行？省长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准。”对这一幕，钟安平印象深刻。

当时，习近平笑着回答：“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的检测设备，一台设备20多万元，检测可以通过尿样检出阳性，这就可以马上判断。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凭着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去测验，就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他介绍说，福建正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对瘦肉精尿样检测需要的设备、试剂等经费的财政投资。对蔬菜农残，福建的农业科研部门自行研制出一种速检仪器，已在全省推广。

“这说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视依靠专业技术手段，要求政府部门包括科研单位都来出把力。”钟安平说。

重拳治“污”，效果可谓立竿见影。2001年当年，全省生猪产销环节的瘦肉精检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

此后，各级政府各部门对治理餐桌污染依旧没有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十多年来，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向好转，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省每年都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还多次与福建的同志谈话，强调要继续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钟安平说。

将人民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秉持的原则。

“群众的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始终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1991年初，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刚满7个月时说。

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抓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主导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强调，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几件实事。”

“‘福州的路，这边起火，可烤焦对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旧城道路的狭窄。对这么一座城建欠账太多的城市而言，仅靠国家投入的资金改造旧城，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晋安河边、荒芜的尤溪洲等逐一调研，他对旧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旧城改造有机地结合，采取群众集资、吸收外资和国家投资一起上的办法。由此，福州旧城改造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由原来的见缝插针式零星改造，发展为连线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还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争先，犹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不懈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需要啃下硬骨头。福建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勇于先行先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一往无前，才能早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福建”蓝图化为现实。

（福建日报 2017年7月17日）

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开放篇

闽山苍苍，蕴育先行活力；

闽水泱泱，奔涌开放大潮。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台湾一衣带水，渊源深厚；旅居海外的千万闽籍华人华侨，心系祖国，热爱乡梓。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开放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脉动。

“对外开放兴，福建兴；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机会越大。”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9·8”投洽会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谈的一番话，至今仍激励着福建人民。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的十七年半，恰恰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他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无论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宁德地区，还是在沿海开放地带的省会福州，主政期间，习近平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在开放浪潮中不懈探索与实践。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追寻足迹，本报记者走进宁德、福州、平潭等地，走访曾经的参与者、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记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开放之路”。

前瞻·解放思想坚定开放

“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1988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上任。当时的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由于贫困，一些群众安于“穷自在”；由于闭塞，一些干部习惯“等靠要”。

脱贫致富任重道远。而临海朝洋的地理环境、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使闽东面临着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机遇。

辗转闽东九县调查研究后，习近平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当务之急，就是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样，才可跳出老框框看问题，也可以振奋精神。

当时，闽东四个沿海县中宁德、霞浦已列入开放县份。习近平认为，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提倡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扶贫的结果将是开放

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因此，闽东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和扶贫的政策双管齐下。

这些全新的开放理念给封闭的闽东打开了新的发展思路。

两年后，习近平调任省会福州市委书记。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1994年5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他说：“沿海是我们辽阔的地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优势所在，我们切不可忽略了这一优势，也不能搞成单一的开发，而是通过综合开发，形成大产业优势。”当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

时隔18年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讲述者：龚雄（时任福州市副市长）

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改革开放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人们思想中存在一些疑虑，有些杂音。然而，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却有坚定的信念和准确的判断，不是观望，也没有摇摆，而是旗帜鲜明地带着大家走改革开放之路。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当清官，不要当太平官”。太平官是怕事的，不敢担当。习近平不怕。他总是鼓励大家把想法说出来，大家议，他来拍板，负责到底。

1990年6月，到任后不久，他便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当时，合资大量涌入，不仅集中在市区和闽江口地带，连县里和一些沿海乡镇也有。有些干部比较保守，“吃不准”政策，犹豫不决。在和县、乡、村的干部座谈时，习近平用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8个字来形容。他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吸引合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好机遇，这种机遇不常有，抓住它，就会对今后若干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错过它，就要落伍。面对机遇，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做出迅速反应，要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迎上去。他一再叮嘱大家，思想要开明，要看长远点，要充分做好迎接机遇的准备，积极认真地做好规划。

对外开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市里把1991年4月份定为“增强对外开放意识宣传教育月”。习近平要求大家精心组织好，既大造声势，又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行“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教育，增强开放意识。他同时要求宣传教育活动要和改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软环境相结合，从一点一滴做起，以吸引更多的外商。

记得那时候，全市各系统各部门举办不同类型的报告会近百场，一些涉外部门走上街头开展涉外咨询活动；许多部门和单位主动深入基层，解决了部分三资企业在土地审批、产品销售等环

节上的问题。这种强化宣传的方式，效果好，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存在问题。

“他知行合一为闽东开放夯实基础”

讲述者：李金焯（时任宁德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宁德，对外开放软硬件都“先天不足”。一方面，基础设施薄弱，电力、通信发展滞后，严重拖了工农业生产的后腿。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一些干部存在“落后病”——有的“等、靠、要”，把党和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当作“摇钱树”；有的急功近利，对一些开发性生产的中长期项目和基础工作兴趣不大，信心不足。

习近平来了以后，一方面在改变干部群众观念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在改进基础设施上花大力气。

他在调研中发现存在问题后说，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这种愿望是好的，热情也非常可贵。但寄希望于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相互结合。这番话给一些急于求成的干部“泼了冷水”。

他的态度很明确，“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当然，对一些大项目，我们也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将来时机成熟了，是可以大干一番”。

当时，适逢中央作出在全国开展三年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

抓基础设施建设，既符合治理整顿的精神，也将为经济发展准备必要条件。

在他的推动下，截至 1990 年，宁德全区行政村通车数达 1179 个，占全区总行政村数的 55.88%，初步形成公路交通运输网；港口建设初具规模，码头泊位增加到 80 个，赛岐港初步形成闽东的港口中心，总吞吐量达 47.7 万吨，居全省第四位；三都澳港成为闽东重点物资中转过驳的疏运点。至 1990 年 8 月，全区各县实现长途电话全自动拨号。闽东当时的电话通信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

“他让我把沿海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去”

讲述者：雷仕庆（时任霞浦县崇儒畚族乡党委书记、霞浦县副县长等职）

我是畚族人，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有过几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 1988 年 7 月。当时，我是霞浦县崇儒畚族乡的党委书记，崇儒是县里的三个畚族乡之一，也是老区重点乡。习近平任宁德地委书记后不久便来崇儒畚族乡调研。他轻车简从，随行的只有地委一名工作人员和县委书记陈济谋。习近平提出到附近村子里转转，我们便一路走一路聊。从乡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思路，到畚族的习俗和传统文化，他问得仔细。到了溪边村老支书张霞瑞家里，了解到村民主要靠茶叶、生姜等农副产品流通来发展经济，习书记突然问我是毕业于哪所学校，得知我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他说，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畚族乡长期封闭，缺乏与外部交流，有许多影响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你读

过大学，发展理念跟得上，更要有开放的意识，要争取以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去打破畚族乡原有的封闭。他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

第二次是1991年初。当时，我被派到福清市挂职副市长兼融侨开发区副主任。作为山海协作的项目之一，宁德在那一年共派出5名干部到长乐、福清、莆田等沿海县市挂职。恰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到福清调研，召集五套班子成员开座谈会。没想到习总书记竟然在会场上认出了我。得知是来挂职的，他当场就说，这位是闽东来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你们要多支持他的工作。会后，习总书记特地把我叫到身边，说：“福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在这儿挂职，要多调研、多借鉴，好好学一些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带回闽东去。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闻听此言，我倍感鼓舞。

两年后，我挂职结束回到霞浦，还专门给县里的乡镇干部作了题为“敢闯天下的福清人”专题报告会。后来，我被提任霞浦县委副书记，分管外经工作。这段挂职经历积累的经验，给了我很大帮助。

“他对发展海洋经济有超前理念”

讲述者：刘嘉静（时任平潭县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对发展海洋经济有一种超前的理念和认识。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他系统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当时，大家关注更多的都是陆域，很少有人提到海洋国土。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大家都有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以疑惑居多。虽然在当平潭县委书记之前，我是福州市水产局局长，多少也跟海洋“打过交道”，但对于海洋开发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养殖捕捞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为什么选择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的大会？这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国土思维，也体现了他对于发展海洋经济的期待。那时，平潭陆地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若单从陆域来说，毫无疑问是小县。但平潭同时拥有 6000 多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把广袤的海洋面积算上，平潭就是大县！

在研讨会上，习近平说：海洋开发是当今世界的热点之一，也是实现福州市今后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上福州”的总体布局是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战略布局高瞻远瞩。

他还特地对我们这些平潭的干部强调，四面环海的平潭在这方面比其他地方优势更明显，应当在建设“海上福州”中出大力、出经验、出成果，要积极引导全县树立海洋国土资源观念，既要做好海岸的文章，也要做好海上的文章，既要做好海面的文章又要做好海底的文章，促进海岛建设从基础开发向功能开发方向转变，下大气力抓好养殖业、捕捞业、海运业、加工业等四个重点，带动海岸开发总体水平的提高。

客观地说，当时发展海洋经济是个新命题，对海洋进行立体式的、全方位的综合开发，习近平的这些发展思路让我们耳目一新。大家茅塞顿开。

思路打开后，平潭积极发展旅游业，还积极拓展远洋渔业，组织了16艘大型远洋渔船，浩浩荡荡出海。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渔业基地补给、渔货管理等都保障不足，第一次远洋捕捞并不能算成功，吸取了一些教训。后来，县里收购了一家外资水产公司的渔业基地，将其作为配套，平潭的远洋捕捞业逐步发展了起来。

开拓·内联外引双向开放

“由于时间、地点、生产要素组合不一样，开放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照搬特区、开放城市的做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

——习近平《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闽东和福州，不同的基础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注定走的是不同的开放之路。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沿海开放发展经济带？习近平不断探索、开拓创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当时闽东被称作我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1988年7月，习近平在闽东九县调研中指出：“沿海发展战略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地处福州、温州两个经济活跃的开放城市夹缝带的闽东处于什么位置应当考虑。”当时，在南面的福州及闽南一带，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正走着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道路，对闽东的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但闽东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走外向型经济，依然缺乏

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他认为，闽东的沿海开放，正处于打基础的时期，是属于开发式的开放。因此，在扩大内联协作上下了更多功夫。“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他提出了“双向开放”“双向开发”“扩大开放”“外引内联”的发展道路。

到任福州后，习近平主张进一步提高福州经济的外向度，以福州开放城市和马尾开发区为中心，形成闽江口两岸大福州“金三角”开放地带，并逐步向闽东北辐射。1994年4月2日，在福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是福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生命线。福州的区位，决定其必须走开放的道路。他说：“福州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中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主要是我们没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没有简单模拟别人的办法，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主义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稳步利用外资改造旧城、发展创汇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福州推行双向开放，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到海外境外设窗口、办实体，把经济触角向外延伸，也提高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改革开放成为活力之源。“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内联协作求发展

讲述者：朱怀瑜（时任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

早在1986年，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建阳（今南平）五地市在建阳召开了首次横向经济联合恳谈会，目的是互相辐射、互为依托，使开放有更广阔的腹地。“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建

立机制，在这五个地市之间每年举行一次恳谈会，以推动地市之间、企业之间、城乡之间经济联系和各项交流发展。

习近平到宁德任职后，对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非常重视。第四次恳谈会 1989 年在莆田举行，当时参加会议的五地市领导中，并不全是“一把手”，但作为宁德地区代表，习近平亲自带队参会，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几次筹备会，他都和大家一起梳理宁德的优势和不足，甄选需要协作的项目，并分析为什么要拿它们出去、协作能给宁德带来哪些好处。他还跟我们讲：要多走出去，要多带企业出去看看。五地市横向联合，宁德肯定首先受益，因为贫困地区总是更需要别人支持。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这次恳谈会上，各地市代表发言中，习近平介绍得特别好，他的讲话内容集中在宁德的发展方向、宁德的重点项目以及需要哪些支持，全都讲到点子上。之所以能这么精准地发言，是因为他“做足了功课”。事实证明积极走出去是对的，恳谈会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效果很明显。比如，霞浦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新型电子秤，急需液晶显示器和传感器等主要配件，莆田市电子工业器材公司可以提供，两家在会上达成联合生产协议；莆田天龙电子计时企业联合公司生产电子产品，年需进口线路板 1000 吨，闽东敷铜板厂年可产 600 吨敷铜板，双方议定共同加工开发线路板；而闽东敷铜板厂年需酒精 900 吨，莆田可以供应……

这种联动，实质上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经济、技术的组合与协作，企业之间实现了扬长避短，不仅提高了单个企业和局部地区的生产力，而且能产生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除了恳

谈会，五地市还在水产、外贸、物资等方面举行专业洽谈会。现在看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更像一个平台，而习近平在当年就把这一平台运用得很好。

1990年11月20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第五次恳谈会在宁德举行。已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依然亲自带队参会。内联工作成为福州市改革开放的十件大事之一。

在第五次恳谈会上，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改称“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五地市经济协作区”，简称“闽东北五地市经济协作区”。按照“山区沿海一盘棋”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以福州中心城市为依托、企业联合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经济联合，实现了从单纯内联走向“内联—外向”的更高层次。

马尾的事马上办

讲述者：林兴才（时任马尾区委书记兼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

习近平雷厉风行，求真务实。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马尾，于198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高科技园区和地方行政区于一体的特殊开发区域。在福建改革开放历程中，马尾举足轻重。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后，要求经济技术开发区“眼睛朝外，成为带动全市经济走向世界的‘排头兵’”。

他支持开发区建设，言出必行。1991年2月23日，省委、省政府曾在开发区举行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代表福州市委、市政

府做了 12 条表态，包括省里放给开发区的权，市里决不设卡；市委每半年至少研究一次开发区的问题；市政府每月到开发区现场办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

当时，一些项目的引进和保税区建设，相关工作在报批过程中，涉及市里好几个部门，很繁琐。习近平于是特别重视现场办公会。他总会事先征询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后，在现场办公会上就拍板解决，效率很高。

当年我们引项目进马尾，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落户挺麻烦的。常常一个项目进来，就要为了三五个人的户口跑一趟市里。于是，1991 年下半年，我们向市里提出，能否一次性批给我们 100 个户口指标，方便引进人才。市里有些干部觉得马尾口气太大了，一开口就想拿下这么多指标，有不同意见。但是习近平很爽快地就批了。他只强调说：“对一个地方发展是否有利，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口的质量，在于人口的构成。”那一年南平市有两家工厂在马尾开设分厂，相关干部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问题，就是在当年 11 月 8 日举行的现场会后很快就解决了。户口一解决，他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去市里参加会议，晚饭后在招待所偶遇习近平。他问我开发区工作进展顺利不顺利，我说有些事情现场办公会后落实还不够快。他当时也没多说什么。没想到年一过，市委督查办的工作人员就来了马尾，把过去几次现场会定的事项，哪些解决了，哪些没解决，统统翻出来确认。还没解决的，现场敲定解决时间。

寻找开放的“金钥匙”

讲述者：练知轩（时任福清市委书记、福州市委副书记等职）

开放开发，是一条摸索之路。习近平站位很高，考虑也很长远，他曾用一则童话故事来比喻：谁得到了“金钥匙”，谁就能打开封闭的大门，获得所需要的财富。他说，我们也在寻找打开开放大门的金钥匙，那就是在招商引资上“引大促小”，通过海外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和大客商的带头牵引，影响带动一批中小客商来福州投资兴业。

当年，福清就是照着这个思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财政收入只有5000多万元的农业县，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及多个省市级开发区、工业区的县域经济强市。

我清楚记得，从1990年到1996年，习近平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的6年期间，一共到福清66次，在福清举行过19次现场办公会，亲自带领我们搞好投资环境，招揽更多外资企业落户福清。

那几年，福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招商引资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前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招商引资。作为随行人员，我们的共同感受是，跟着习总书记出访，节奏快、效率高、收获大。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回出访新加坡，我们一共呆了6天，每天忙完所有既定事项基本上就到夜里12点了。回到酒店，大家还要汇总当天情况，碰头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和项目洽谈计划，全部搞定往往都到凌晨2点多了，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出访期间，习近平总是亲自洽谈每个项目，亲自接待每位贵宾，参与商讨行程安排……正是这种亲力亲为，感染了所有随行

人员，也感动了当地华人华侨。真心诚意和辛劳汗水换回了硕果累累，那几年，习近平带着我们与印尼林氏集团签署了由其开发建设元洪投资区的协议，商定在投资区内筹建钢铁厂、造纸厂、油脂厂、面粉厂等企业；他亲自主持洽谈福州第一座3万吨级的杂货码头——元洪码头的项目，这个码头于199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是我国一级口岸之一。时隔这么多年，元洪投资区稳步发展，已形成粮油食品、纺织化纤、轻工机械、能源精化四大优势产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重视招商引资，但常说的一句话却是“办好现有的企业是最好的招商”。他经常跟班子成员以及相关部门的同志说，引进的企业如果办倒闭了，我们首先要检讨的是自己。只有政府的工作做到位，企业才会安心留在这里，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他让平潭“深闺有人识”

讲述者：何文（时任平潭县旅游局党支部书记兼副局长）

这几年，平潭国际旅游岛如火如荼地开发建设。看着平潭日新月异，我真心佩服习总书记当年的发展思路与远见，若非他提出“旅游兴县”的战略构想，也许平潭至今“处在深闺无人识”。

上世纪90年代初，平潭是偏居一隅的落后县，是饱受风沙侵袭的“孤岛”，要谈开放开发何其难。

1991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国家旅游局和省、县旅游部门联合在平潭进行旅游资源普查和开发规划。次年12月，平潭风景区获批成为省级风景区。

平潭旅游到底能不能发展？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由于长期处在海防前沿，岛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搞旅游，很多人在笑，也有一些人在骂，说肚子都吃不饱，搞农业、工业都来不及，搞什么旅游。

习近平让大家吃了“定心丸”。我至今完整保存着当年他就加快平潭旅游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记录。

第一次讲话，是1993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平潭调研座谈会上说：“旅游开发的连带效应是无限的。石头、沙滩、海（湖）水、阳光、林带等资源的最佳组合将变成巨大的财富。平潭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的海貌风光有独到之处，是国内甚至世界上少有的，发展旅游业前景广阔。”他对平潭的干部说：“我们首先要提高认识，旅游业是平潭将来搞经济建设的一个特色。要爱惜、保护好旅游资源。其次要快马加鞭地制订岚岛旅游建设规划，全方位开放，引进外资、内资、群众集资共同开发，多腿走路，步子迈大些。”

1994年1月，平潭海坛风景名胜区列入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当年5月25日，习近平在市委、市政府平潭现场办公会上，就平潭的旅游开发再次提出要求：乘势而上，扎实工作，使宝贵的旅游资源兴县富民。他还特别强调，要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好的自然资源景观一旦被糟蹋了，用再多的资金也恢复不了。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对历史有交代。

在那之后的几年，平潭县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严打非法挖沙采石行为，修建了景点接驳公路，建设了景点配套设施。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了交通、通信、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1999年2月，我们收到建设部寄来的《关于提交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准备材料函》，其中全国28个国家级风景区获申报资格，平潭就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很激动，更加坚信，发展旅游，路走对了！

就在当年10月24日，在平潭调研座谈会上，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第三次对平潭旅游业发展提出要求。他说，旅游业对平潭来说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课题，21世纪旅游业一定会越来越发达。要保护好我们现有的环境。一定不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担当·闽台交流先行先试

“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从而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推动统一大业的进程。”

——1990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州市对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两岸交流日，乡愁自解时；海峡有隔阻，不阻云彩飞。”

祖籍福建永春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一首《乡愁》道尽海峡东岸台湾同胞的绵长乡关之思。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地在福建。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福建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关注台湾问题，关心台湾同胞。在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福建工作了17年半的习近平，始终倾力为之。他高度重视做好对台工作，

不遗余力推动闽台交流合作、厚植两岸人民感情，努力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我本人在福建工作多年，现在想起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有关台湾的事情，要经常会见台湾同胞，也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我离开福建到现在，始终关注着台海局势，期待两岸关系持续改善。”2013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这样回忆。

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等招商引资思路，带动福州开放型经济风生水起，为培育壮大汽车、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打下良好基础。

1999年，李登辉鼓吹“两国论”，其分裂祖国的言行，给两岸关系蒙上了阴影。当年8月10日，习近平被任命为福建省代省长的第二天，就在福州召开台商代表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闽台经济合作，不论两岸关系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切实依法保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并继续推动闽台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闽台各项交流。

与会台商代表深受鼓舞，表达了他们将在福建扎根发展、永续经营的决心。

座谈会后，习近平马不停蹄走访了福州马尾、闽侯、福清等地的大型台资企业，明确表示，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希望台资企业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广大台商台胞朋友，福建省各级政府领导不但要深交老朋友，还要广交新朋友，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

闽台近在咫尺，但一湾浅浅的海峡，曾是横亘在两岸同胞骨肉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下，习近平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方便两岸民众往来。1997年，福州、厦门港被指定为两岸直航试点港口并正式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两岸48年来没有商船直接往来的历史。

2001年1月2日，“小三通”破冰，厦门到金门、马尾到马祖的“两门”“两马”客运直航启动，从此拉开了闽台人员直接往来的序幕。

“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它有助于扩大两岸人民交往，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两岸关系。”在200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时任省长习近平说，“两岸合作交流是大势所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2008年，“大三通”实现，闽台海运直航、直接通邮和空运直航正式启动，为两岸关系发展史树立了里程碑。

2009年9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一年后，习近平来闽考察，要求实验区敢于先行先试、创新机制体制、完善发展规划，努力在两岸交流合作中走在前头。平潭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投资热土。

筑巢引凤+引凤筑巢

讲述者：吴金梯（时任福州市外经局局长、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筑巢引凤，引凤筑巢。在对台经贸往来中，习近平非常重视软环境建设，悉心打造招商平台。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潮涌，加之“九二共识”达成带来的效应，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速，引进合资大幅增长。

但是，那时候大部分台商对大陆尚不熟悉，需要更多的沟通。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特别看重返乡台商的情谊，重要客商来的时候，他都是亲自接见，和他们交换对福州经济发展的看法，不少与他打过交道的台商都称赞他低调、亲和、愿意倾听。那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记得当时福州通往福清的主干道在修建，路况很差。有一回，一位台商在去福清的路上差点出交通事故。习近平得知后，立刻要求相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台商路上交通安全，同时让市政府派专人陪同，用心服务。

虽然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习近平在改善软环境上下功夫，强调要筑巢引凤，引了凤要筑巢。1994年6月21日，福州市台资企业现场办公会在鼓山镇召开，现场解决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当场宣布，在市外商投资企业领导小组中，专门建立对台经济工作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对台经济工作有关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类似的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台商投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当年，为了招商引资，我们经常参加外地的一些展会、寻找商机。1994年7月，习近平提出我们自己来办展。他谈了两点设想：一是招商展会不能搞形式，热闹几天就过了，要办就要常态化，拉长时间，搞个招商月，让投资方有充分的时间接触和洽谈；二是不要单纯办成福州的招商对接会，建成一个平台，同时邀请国内其他省会城市一起参加，既能聚人气，也能实现资源共享。当年10月，在习近平的直接推动下，首届“福州国际招商月”隆

重举行，2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客商参会，前所未有的开放大平台吸引了全球目光。招商月期间，福州市共推出招商项目120个，其中重点投资领域和重点项目21个。

半年后，1995年4月，第二届招商月再次成功举行。从此，每年一届。1999年，福州国际招商月拓展、提升为“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即“海交会”），由此成为祖国大陆最早举办的海峡两岸经贸展会之一，一直延续至今。中华映管、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闽台重点合作项目都在这个平台上孕育而出。

助推台资项目持续发展

讲述者：张秋（时任闽侯县委书记、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等职）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抓住历史机遇，承接了第一波台资产业转移，通过招商平台吸引了中华汽车、冠捷电子、中华映管等台资企业，带动和培育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群，为福州此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这些重大台资投资项目顺利落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倾注心力，亲自关心和推动。海峡两岸汽车业合作的典范——东南汽车，在1995年8月签约，落户闽侯县青口镇。为了洽谈这个项目，仅1995年，习近平一年内三次会见台湾中华汽车客人。

1995年底，我从闽侯调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任前，习总书记找我谈了话，要求加快开发区建设步伐，使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他还专门提到开发区里的一些台资项目，叮嘱要创造条件办好，发挥其牵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当时，开发区里最举足轻重的合资项目无疑是中华映管。中华映管是在我省投资最早的大型合资企业之一，1994年初落地福州时，曾引起两岸轰动。那是一个总投资6.3亿美元的项目，在当年折合人民币约50亿元。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较之其他投资项目，就是个天文数字。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心里也没底。到底敢不敢接？习近平非常果断，他看好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也敏锐地判断这个项目将对福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召开了多场协调会，考察了多个选址地点。最后，花落马尾，三条黑白显像管生产线相继投产。

然而，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却遇到了一些波折，中华映管原定的另两条彩管生产线一直迟迟未能如期落地。2001年2月，开发区专门向时任省长的习近平书面报告了相关情况，习近平当即作出批示：“反映的情况颇值思考，引进合资还要有紧迫感，关键要立即行动，重要之处在于把握脉搏，找到症结并对症下药，开好处方。”同时，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专题解决合资招商问题，并专题研究中华映管问题，提出有关研究方案。

相关各方随后积极行动，产生了良好效果。当年7月，华映决定调整2条生产线到福州，并把原计划次年动工的第五期2条生产线提前动工。我们把这一情况及时向习近平汇报后，他再次批示：要趁热打铁，尽早促成。

20多年来，中华映管在福建顺利发展，为福建电子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如今，电子信息产业成为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打造首个台企工业村

讲述者：陈齐云（福清洪宽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月19日是我们的“建村日”。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这一天，都有多家企业共同举行奠基典礼，可热闹了！那时候，大家提到洪宽工业村，都会说我们是“小台湾”“台湾村”。这话一点不假。

作为全国第一个以合资企业为主的工业村，洪宽赫赫有名，它是在习近平的直接推动下发展壮大的。洪宽工业村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溪头村，是爱国侨领林文镜先生的故乡。当年，在洪宽工业村成立前，这里贫困落后，人均年收入只有100多元。资源有限，土地贫瘠，种庄稼没什么收入，年轻人也没地方去。上个世纪90年代初，林文镜返乡投资，建立了洪宽工业村，并确立了“以侨引台、以台促侨、侨台联合”的招商引资策略，此举得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大力支持。

习近平一直关注、关心洪宽工业村的发展。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情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是首家台企的入驻。当年，林文镜通过亲戚找到两位台商，动员他们来洪宽村投资兴业。两人被福州良好的投资环境所打动，就来了，创办了宏茂塑料。这是首家入驻的台企。1990年10月，宏茂塑料动建厂房。习近平特地到场，与大家一起共同见证了奠基。宏茂塑料顺利入驻后，很快引来第二家台企——茂山制品。多年后，当年投资的台商感慨说：“当时，台湾尚未开放对大陆投资，到福清投资还是有很大风险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福清及福州市的开放意识和行动非常领先。”

第二件事，是1991年9月，村里有十几家企业共同举行奠基典礼，习近平又专程来参加了。当时，村里已经有20多家台企，包括制鞋、服装、刀具、拉链、塑胶制品等。习总书记仔细调研，关心大家的发展情况，听取建议和要求，我们都很受鼓舞。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洪宽工业村如今成为福州市最具工业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入驻企业有102家，其中台企65家，占比63.7%；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78亿元，占福清工业总产值的22.2%；村民人均收入4万元。

共赢·互学互鉴沟通世界

“福建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在21世纪，这里的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将竭诚为前来投资的人士提供良好的服务，以更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人，以更开放的姿态迈向新世纪。”

——1999年9月，习近平会见参加第三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外贵宾时说。

拓海开洋，丝路帆远。

福建是著名侨乡，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长期以来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频繁，人文交往密切。

昔日众多闽籍乡亲正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旅居海外的1200多万闽籍华侨华人中，80%集中在东南亚；而东盟国家2000多万华侨华人中，有近1000万人祖籍福建。东南亚成为海外闽商最早的创业基地，也是福建人漂洋过海创造财富最集中的

地方，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的闽商。他们热心桑梓，为两地经贸往来积极牵线搭桥。

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积极推行“引进来”和“走出去”，努力打好“侨牌”。他重视与港澳台交流交往，开拓经济合作新领域；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密切与世界各大公司、知名友好人士的往来；还多次率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在异邦他乡开展经贸活动和科技、文化交流，介绍改革开放政策，为海外华人华侨传递乡情与友谊，坚定了他们回祖国大陆投资兴业的决心与信心。在良好的互动中，大家开拓了视野，深深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魅力与力量。

开放交流之中，保持对外经济、文化的吸收吐纳，寻求发展。习近平同时积极推动福州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与欧、美、日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缔结友好城市，互学互鉴、合作共赢，诠释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道理，见证了福建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诚挚友谊，也传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东南亚的福建元素

讲述者：龚雄（时任福州市副市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掀起了华人华侨返乡投资热潮。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除了经贸活动，他还特别注重人文交流活动。

作为随行人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出访。一次是1992年5月，赴新马港澳等地进行经贸考察，此行历时17天。每到一处，习近平详细介绍了福州市的投资环境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设想，探讨经贸合作的可能，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华人社团和著名企

业家的热烈欢迎，广泛联络了海外乡亲，也扩大了福州对外宣传。那一趟，收获满满，签订了17个利用外商投资项目，引进外资额达20亿美元。

另一次是1993年的印尼之行。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和华侨林文镜陪同代表团一行去了印尼爪哇岛中爪哇省的商港和首府三宝壟参观。这座城市的名字，来源于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小字“三保”，也称“三宝”，于明永乐年间抵爪哇岛中部的海港登陆上岸，开展和平贸易，进行友好交往。后来当地人为纪念郑和，就把他首次登陆的地方叫作三宝壟，并立庙祭祀。

参观时，习近平很感兴趣，也很感慨。他说，这些遗迹、传说和习俗，都反映了海外赤子对华夏的深情和热爱，也显示了当地人民对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的怀念和崇敬。

巧的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城里也建了一座中国式古庙——三宝庙，其历史同样跟郑和下西洋相关，成为中马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在马来西亚沙撈越州诗巫，那里也称“新福州”。100年前，闽清举人黄乃裳率千人到诗巫进行大规模垦荒活动，经过百年发展，诗巫成为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第三大城市。那里的福州十邑移民及其后裔，讲福州话、过福州传统民间节日，生活习惯一如在故土。

这几个地方，都给习近平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在闽工作期间多次出访东南亚，与海外华人华侨交流交往的经历，一定会让习近平更加深刻体会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力量！

《丝海梦寻》寻梦“海丝”

讲述者：吴玲红（原福建省歌舞剧院编导，《丝海箫音》主创人员之一）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确认了泉州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省里认为，这是宣传福建的契机，要求省歌舞剧院编一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舞剧。

那时，我是省歌舞剧院的一名编导，被邀请进入《丝海箫音》剧组，承担编舞的工作。1992年，舞剧推出后，反响很好，接连演出好几场。没想到，有一位重要观众，观看演出后一直惦记在心间，并在20多年后，促成了这出舞剧的改编。

这位重要的观众，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2014年5月，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召开。对峰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能少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建议筹备组进行补充。他还特地提到了，23年前，曾在福州看过舞剧《丝海箫音》。

很快，我们就接到了通知，以《丝海箫音》为母版，新编《丝路梦寻·海》，准备亮相上海“亚信峰会”。经过紧张排练，新剧以闽南风格浓郁的舞蹈语言、精美的舞蹈音画形式，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泉州在宋元时期云集各国使者与商贾，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的历史。2014年5月20日，《丝路梦寻·海》作为上海“亚信峰会”的开场歌舞，登上了国际舞台！

这场演出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亚信峰会闭幕后，省里让我们在《丝海箫音》基础上，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重新创排了大型舞剧《丝海梦寻》。当年8月，《丝海梦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随即，承载着文化交

流使命，开启了“海丝”寻梦之旅！2015年2月和4月，《丝海梦寻》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厅上演。这两年，港澳台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都留下了我们交流演出的身影。

习总书记说过，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确实如此。

跨越 20 余年的友城

讲述者：林孔章（时任福州市外办主任）

2015年9月，两个远隔重洋的港口城市，福州市和塔科马市，因为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故地重访”，吸引了世人的瞩目，一段横跨20余年的中美友城历史也引起人们的热议。

塔科马是华盛顿州第三大城市，也是美国西部港口城市，全球最大的25个集装箱港之一，木材加工、冶金铸造、造船、食品加工等产业较为发达，与福州产业互补性较强。

故事要从1993年讲起。当年10月6日，时任塔科马世贸中心执行董事的考妮到福州参加中美建筑博览会，向福州市政府转交了塔科马市长卡伦·韦尔勒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塔科马希望与福州缔结“姐妹城市”的愿望。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年底便访问了塔科马市，探讨两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可能性，也讨论了福州马尾港与塔科马港结为友好港口的愿景。双方都希望以港口业的合作为起点，深化交流交往。

与塔科马缔结友好城市的事情，习近平抓得很紧。经多次接洽，1994年11月16日，福州市同塔科马市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从正式商谈，到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协议，一共只

用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在当时的福州对外交往史上，堪称“最快速度”。

和塔科马结好，福州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又一扇窗，加速了开放步伐，也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的福州、开放的福州。

20多年来，福州市出访团组30批133人次，塔科马市来访团组43批256人次，两市在经贸、文化、教育、体育等多领域合作频繁。

习近平的两次到访，也给塔科马带去了了解世界的窗口。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发表了讲话：“我一直高度重视中美地方合作。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得益于两国地方和人民支持，未来仍然要依靠地方、造福地方。”他说：

“中美民众往来越频繁，两国友好的基础就越坚实，务实合作就越红火。”

暖心的鼓岭故事

讲述者：刘嘉水（时任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8月21日，习近平在福州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友人加德纳太太。她是应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邀请来访问的。

故事说起来有些渊源。加德纳太太的丈夫史密斯·加德纳是加州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曾随父母一起在福州居住十年，1911年10岁时迁回美国加州。童年时夏日在鼓岭上的快乐时光，成为加德纳的珍贵记忆。重返儿时的中国故园看看，成了他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奈何世事沧桑变化，心愿一直难了。直到1986年弥留之际，加德纳口中仍喃喃不绝地叨念着“KuLing”。加德纳太太

经过数年寻觅，终于查清丈夫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一一福州的鼓岭。

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留美学生钟翰写下的这个动人故事。习近平读后深为感动，当即决定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加德纳太太访问福州。当年8月，加德纳太太应邀来华。

习近平在会见加德纳太太的时候说：“福州对外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我们很珍重这样的友谊。令我感动的是，您先生在晚年仍对福州、对鼓岭这样地眷恋，我们请您来看看您先生终生想念的这个地方，并重叙友好。我们也希望这联系、这友谊能继续发展下去，让更多人从这发展中看到更多美好的东西。”

加德纳太太此行将珍藏多年、丈夫从中国带回加州的一对清代出产的福州脱胎漆花瓶赠送给福州。习近平代表福州回赠了一对现代脱胎漆花瓶、一套鼓岭画册风景照和一幅国画。

第二天，加德纳太太乘车抵达鼓岭，还见到加德纳小时候的中国伙伴，替加德纳重续了情谊。

加德纳太太说，加德纳的侄儿也是在中国出生。如果晚辈们也替祖辈父辈故地重游，与中国朋友的后人把盏言欢、共同种下代表友谊的柳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场景！

这个暖心的鼓岭故事，成为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2015年6月10日，以鼓岭故事为创作蓝本的音乐剧《啊！鼓岭》在福建大剧院举行首演，随后在全国30多个城市演出百余场，艺术再现了这段跨越了年代和国界的友谊佳话！

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福建，正借“一带一路”东风，风起帆张，全力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书写开放发展的新篇章！

（福建日报 2017 年 7 月 20 日）